

诗和诗人的使命

——普希金诗歌艺术观念的流变

季明举

(曲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摘要: 普希金不是一个文艺理论家, 没有对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使命问题作过全面的理论阐述, 但却以诗歌创作的形式间接地对这一问题作了认真的回答。普希金的诗歌艺术观念经历了一个由强烈注重诗歌的外在社会功利目的, 进而过渡到倡导诗歌的自足性、永恒道德理想性的流变过程。

关键词: 普希金; 诗歌; 艺术观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6539 (2007) 12- 0057- 05

The Mission of Poetry and Poet

——The Evolution of Pushkin's Poetry Concepts

Ji Mingju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Pushkin is not a literary theorist. He did not make comprehensive theory interpretation to the essence of poetry and mission of poet, but in the form of poetry creation he had given on this issue a seriously answer indirectly. Pushkin's poetry artistic concepts experienced a clear evolution from the strong focus on the poetry's external social utilitarian purposes to the poetry's self sufficiency and eternal moral ideals.

Key words: Pushkin; poetry; artistic concepts

在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 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诗歌艺术, 为了作一个诗人而甘愿放弃公职的第一人便是普希金。普希金之前的俄国作家多出身显贵, 家业丰厚, 且长期担任宫廷要职。如诗人康杰米尔 (А. Д. Кантемир, 1708~ 1744)、剧作家冯维辛 (Д. И. Фонвизин, 1745~ 1792) 和《聪明误》(Горе от ума) 的作者格里鲍耶托夫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1795~ 1829) 做外交官, 诗人杰尔查文 (Г. Р. Державин, 1743~ 1816) 担任宫廷大臣, 诗人茹可夫斯基 (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1783~ 1852) 担任太子的老师, 感伤派小说家卡拉姆辛 (Н. М. Карамзин, 1766~ 1826) 为宫廷史官等。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多半是出于个人兴趣, 为迎合上流社会的时尚, 或干脆为俄罗斯帝国皇权歌功颂德, 唯独没落贵

族家庭出身的普希金是个例外: 他虽然年近不惑之年被沙皇戏弄性地授予一个宫廷侍卫的低下职务 (这本来是专门授予宫廷少年的), 但向来桀骜不逊的普希金, 很快就挂职而去, 专心于文学创作, 打破了当时贵族作家要拥有社会地位就必须担任公职的传统。普希金曾经为自己没有能够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而感到遗憾, 对担任公职不屑一顾, 据说答应做宫廷侍卫也是为了能够方便地进出沙皇专用图书馆, 以便搜集材料撰写有关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小说 (亨利·特洛亚, 1992)。可以说珍视自由, 维持一个诗人、艺术家的超然独立性, 完全听命于缪斯的召唤是普希金在人格和创作上最大魅力之所在。

普希金接受了典型的欧化式贵族家庭教育, 是在法兰西进步文化的影响下长大的, 在彼得堡

皇村中学读书时就有“法国佬”的绰号。他饱读了法国哲学和文学书籍,其中最让他迷恋的就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大思想家伏尔泰。普希金称伏尔泰为“神圣的老者”、“最忠诚的引路人”,“一个极为亲切的交谈者”(亨利·特洛亚,1992)。在皇村中学读书时又与著名《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的作者恰达耶夫^①以及许多十二月党人军官密切交往。这使得普希金的诗歌艺术观念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十二月党人自由精神的强烈影响。其中他在皇村中学毕业初期写成的《自由颂》(Воляность, 1817)一诗最能代表普希金早期诗歌艺术观念,为诗人早期最具有公民激情的诗篇。在该诗的前两段,普希金指出诗人的唯一使命不是沉浸在“柔弱的竖琴”中,而是生来为“全世界讴歌自由”,“扫除王冠上的丑行”。

快给我指明那个至尊的高卢人
所留下的崇高的足迹,
是你,使他在光荣的困境中
唱出了勇敢的颂歌……

普希金提到的这位“至尊的高卢人”是指安德烈·谢尼埃^②,一位因揭露皇权暴行而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政治哀诗的作者。普希金对他非常崇拜并为其不幸命运而感伤。早年的普希金渴望做一个自由的歌者,以讴歌自由,反抗专制暴君为使命。正是在这一激进艺术观念的影响下普希金创作了《致皇村》(Клицю, 1817)、《乡村》(Деревня, 1819)、《致恰达耶夫》(К Чаадаеву, 1818)等系列“自由组诗”。在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诗歌中,普希金明确表达了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目的思想即诗歌要高扬自由的旗帜,为公民、为崇高的社会公共事业服务。具体到俄国现实中,普希金认为诗歌应吹响向自由进发的号角,让残酷的“统治者战栗”,让“奴隶醒悟、振奋”;诗人应时刻倾听“祖国的呼唤”,积极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并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这一艺术理念被后来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文艺批评家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由此影响到百年俄国文学乃至民族解放运动进程。不过对普希金而言,拥有这一“雷列耶夫式”^③的诗歌艺术观不过是个短暂的时期。早在1818年写成的献诗《致尼·勃勒斯科娃》(К Н. Брюксове)中普希金

对诗人使命的认识已经具有了一种超越社会功利目的之上,更深刻的哲学层面的思考:

在我朴素而高贵的竖琴上,
我没有为地上的神明把赞美诗歌唱,
我保持了自由的高傲,
也不向权力顶礼焚香。
我只学习为自由歌颂,
只为自由献出我的诗行。

……

我那不会被收买的声音,
只能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响。

这里“只为自由献出诗行”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歌颂自由,二是保持诗人自身的超然独立品格,只为“羞怯的缪斯”献出诗行,其中没有任何教诲醒世成分的暗示,艺术的目的完全在于别的:回应自己人民心灵的声音。事实上,普希金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改变了功利性的诗歌艺术观,改变了对诗人使命的态度。普希金开始相信,诗歌是“自足”的,不能也不应该服务于某种外在目的。艺术从属于某种功利目的意味着走向了死胡同。1825年4月普希金在写给茹可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说:“你问我的《茨冈》(Цыган, 1823)有什么目的?真是奇怪!诗歌的目的是诗歌本身……。雷列耶夫的《沉思》(Думы)是有目的的,但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④。普希金在这里提到雷列耶夫(К. Ф. Рылев, 1795~1826)并非偶然。雷列耶夫作为十二月党人诗人,一直力图将诗歌艺术应服务于推翻沙皇专制的革命事业的思想贯彻到生活中。他的《沉思》一诗“直截了当”地抨击了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但这一“直截了当”恰恰是该诗艺术审美意义上的失败。因为这里诗歌成为(对作者来说)达到与诗歌本身丧失艺术关联的纯粹功利手段。普希金与雷列耶夫的思想分歧意味着他告别了“雷列耶夫式”的诗歌艺术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普希金走向唯美的、形式的道路。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格·沃尔科夫(Г. Н. Волков)在他的《普希金的世界》(Мир Пушкина)一书中对此曾有这样的阐述:“(普希金)断言过诗歌的目的是诗歌本身,这并不意味着普希金反对诗歌的公民性特征,拒绝诗歌的崇高社会使命。真正的、艺术的诗歌在俄国当时还没有,而那种所谓训诫式的、道德说教式的诗歌

却比比皆是。所以对普希金来说,主要的是创造真正的诗歌,展示诗歌所有的艺术可能性,以最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时代的进步精神。”(Волков, 1989: 101) 在普希金生活的那个时代,拒绝使诗歌从属于为沙俄帝国皇权歌功颂德或者为某种时髦的社会思想摇旗呐喊,追求诗歌的独立性,乃是一种全新的艺术观。1826年普希金所完成的《先知》(Пророк)一诗可以看作诗人全新而独特的诗歌宣言:他宣告了诗歌的神秘宗教实质,诗人先知般的预言性灵感。

《先知》中诗人变成了先知,成了传播上帝旨意的信使。诗中首先出现的是圣经中的六翼天使^⑤:

我为心灵的饥渴所折磨,
踟躅在阴暗的荒原, ——
忽然十字路口有个六翼的天使……
显现在我的面前。……(1826)

“荒原”的形象表达了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宗教感情,它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图景。荒原中折磨着抒情主人公的饥渴并非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于是出现了“荒原”这一寓意形象,即世界的“荒原”、人群与城市中的“荒原”。这个“荒原”是如此的悲凉,无论什么也不能消除人们心灵的饥渴,但在孤寂的“荒原”中因饥渴快要死去的“我”的上方出现了六翼精灵,这个精灵使“我”实现了向先知的转变。

首先诗人失去了现实的视觉和听觉,被六翼天使赋予了“预言家的慧眼”和听力,能够看到、听到“天体的颤栗”,“云霄之上天使的飞翔”。值得注意的是,六翼天使并没有将“我”带往天堂,只是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感悟:瞬间前还是“阴暗的荒原”,此时突然充满了光明和音响。然后六翼天使——

他手指伸进我的嘴巴,
拽掉我罪恶的舌头——
专门歌功颂德和说假话的舌头,
再用血污的右手,
把智慧之蛇的舌头
装进我僵化了的口腔。

被揪去了“罪恶的舌头”的“我”被安上了“蛇信子”。蛇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形象:一方面蛇是智慧的象征,蛇的话是智慧的话语;另一方面“蛇信子”的形象使人联想起准确敏锐的

诗歌语言。最后甚至“我”的“颤抖的心脏”也没有留下:

并在我空了的胸腔内,
硬塞进一块熊熊燃烧的火炭。

这一“熊熊燃烧的火炭”将永远灼烧着诗人,使他时刻不忘记自己的崇高使命:用优美的诗篇去点燃人们的心灵。《先知》最后诗人脱胎换骨,完成了向先知的变异:被赋予了全新的听觉、视觉、蛇信子、火炭心脏,“像一具尸骸躺在荒原上。这时上帝出现了。他在尸体上吹口气,诗人便有了新的生命。“我”因此成了有灵性的先知,从此以后只听命于上帝的灵感,不再担负任何世俗功利的任务,诗歌只为灵魂服务——也只有那时诗歌的话语才真正能“点燃人们的心灵”,才真正获得了超然独立的、圣洁的预言性:以优美的话语激荡起人们心中对永恒真、善、美的渴望。

在完成《先知》之后的1827年,普希金在《阿里昂》(Арион)、《诗人》(Поэт)等作品中同样表达了对诗歌独立艺术使命的思考,而他在1828年完成的《诗人和人群》(Поэт и ола)一诗在表达诗人的职责,诗歌的使命方面最具有代表性。无疑该诗在普希金对诗歌理念的探索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诗篇中诗人是以一个歌者的面目出现的。歌者与人群争论的乃是关于艺术的严肃使命问题。人群问歌者:“为什么你唱得这么响亮,……你把我们带向哪里?”诗人的歌让人群激动、痛苦,于是人群要求使人诗人解释“你的歌对我们有什么益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益处”一词:人群赞同和跟随歌手,只为“益处”而来。这引起了歌手愤怒的驳斥:

在你们看来,益处就是一切——
你们把阿波罗神^⑥像拿去评两论斤,
它的种种好处你们却全然不见。

歌者在此是想说明,没有也不可能来自诗歌的实际益处(功利)。这就是诗人的坚定艺术信条。谁若需要从艺术中获得“益处”,就让他满足于“烧煮食品的陶罐”,至于煮饭,阿波罗太阳神是绝对不合适的:艺术不是平常人家的陶罐。《先知》中接下来好像人群同意了歌者的看法,不再要求所谓的“益处”:既然歌者的歌不等同于“陶罐”,既然歌者是传播永恒真理的先知,是“上帝的选民”,那就用崇高的天赋为人

群谋求福利吧，于是出现了人群向歌者的第二次呼吁：在人群的第二次呼吁中似乎没有了功利的目的。他们好像十分渴望着精神的完善：

你爱你的亲朋，但是也可以，
给我们一些大胆的教诲，
而我们都准听命于您。

但歌手还是将人群撵走了：
走开吧，性喜平和的诗人，
同你们有什么关系！

这是因为人群再次向歌手要求艺术的实际“益处”：让艺术校正他们的言行，给他们训诫之类，即让艺术为人群服务——这正是歌者所不愿意的。更主要的是，歌者不允许自己的内心这么做。因为艺术不应该，或者根本无力去担任什么“教师爷”，它存在于功利之外。上帝将歌者变成先知，是为了让他“用言语点燃人们的心灵”，而不是实施教诲。可以教会人一门语言或者数学，但美是教不会的。就像可以教人学习怎么押韵，却无法教会他最终成为诗人一样。美的觉悟需要特殊的心灵机制。美的探索者走的是一条充满痛苦的荆棘路，是为了求真而漂泊自己的心灵。诗人是超凡脱俗的先知，而诗是充满灵性的东西，引导人们走向精神的高贵。真正的诗人——

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与祷告。

这首诗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诗人在高傲的孤寂中完全封闭了自己，人群对他来说完全是多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看这首诗的题词“Procul este, profani!”^⑦，就知道它是写给内行的人，是写给理解艺术的真正使命，并不从中期待什么“益处”的人。而对于那些偏离艺术自足性，热衷于“教诲”的诗人，普希金在诗中有这样的预言性警告：

在你们喧嚣的城市里，
从大街上清理垃圾——

多么有益的劳动！

难道你们的祭司们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忘记了祭坛和献祭，
也操起了扫把？

《诗人与人群》的确是一部纲领性的诗篇，对俄国诗学观念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19世纪中叶的“纯艺术派”诗人以及批评家主张所谓

“为艺术而艺术”，力图将诗歌的公民性完全驱赶出去，将普希金列为“自己人”，所依靠的就是这首诗。而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以及机械唯物主义美学理论家将诗歌公民性原则强调到教条主义程度，认为俄国文学发展的“普希金方向”已经过去时，所立论的依据也是这首诗。^⑧我们只要对照一下涅克拉索夫那首堪称革命民主主义派文学宣言的《诗人与公民》（Поэм и граждaнннц, 1856）一诗，就会找到这位“公民诗人”与普希金的分歧正是《诗人与人群》。涅克拉索夫说：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但是你必须做一个公民。

普希金的愿望则是只做一个诗人，或者说诗人首先应该是诗人，不可以不去做诗人而仅仅做一个愤世嫉俗的公民。为了做一个公民而牺牲掉自己诗人的身份是不应该的。而诗人作为诗歌的创造者理应处于人群的世俗评判之外。人群眼前的物质利益和“益处”永远不能成为一个诗人背弃缪斯的借口。不过普希金在《诗人与人群》中并没有说诗人可以因为只做一个诗人而漠视甚至无视自己的公民身份，摒弃坚定的道德信念。诗人的真正公民性是凭借先知般超凡脱俗的听觉和视觉，回应人民，表达人民永恒的道德理想和愿望。这里诗人真正拒绝屈从的是人群暂时的、眼前的物质利益，拒绝的是社会功利式的“教诲”，赶走的是热衷于“益处”的“外行者”，回应的则是充满永恒道德理想精神的俄罗斯人民。在普希金看来，诗歌的审美意义和其真正的公民性是密不可分的。在总结一生诗歌创作的诗篇《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Я об епам ятник ъ руркoтвoрннй вoз двнгу л）中，普希金准确地表达了诗人应该跨越历史时空，成为人民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精神表达者的思想。对于《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一诗如果我们抛开历史文化语境去解读是不恰当的。该诗的拉丁文题词“Exegi monumengtum”^⑨来自古罗马大诗人、文艺家贺拉斯的《纪念碑》一诗（该诗后来被众多欧洲诗人竞相模仿）。贺拉斯将自己一生的创作看成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并将其与罗马帝国甚至古埃及的荣耀进行对比，相信只要罗马帝国尚存，他的诗歌就会受到人们纪念碑式的顶礼膜拜。贺拉斯相信自己的诗文具有不朽的成就，他的纪念碑无疑是欧洲文化史上一座古

典、崇高、高贵和优雅的纪念碑。其中有这样的诗行:

我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它比坚固的黄铜和高于金字塔的帝王宫殿更加巍峨,

侵蚀的雨水、滚滚的轮回和漫漫的岁月都消灭不了它。

是的,我不会彻底死去,

幸运之神将使我的许多部分长存,

我那光荣的桂冠将万古常青!^⑩

普希金本人通晓拉丁文,曾经亲自译过贺拉斯的诗歌。正是贺氏的《纪念碑》,激励他写出了自己不朽的“纪念碑”诗篇。但我们如果将贺拉斯的《纪念碑》和《我为自己竖立起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相对照就会看到,普希金并不像贺拉斯那样将诗歌创作与自己帝国的荣耀结合起来。普希金的视角不仅是面向祖国和俄罗斯人民,而且达到了宇宙性的高度,面向的是整个人类,即每个人的心灵:

我会得到光荣,即使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
到那时只流传一个诗人。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的老师,著名古典主义诗人杰尔查文(Г.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在晚年也曾写有《纪念碑》(Памятник, 1795)一诗,表达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与俄罗斯帝国的不可分割性。毫无疑问普希金受到了贺拉斯和杰尔查文《纪念碑》诗篇的启发,甚至在诗的节奏和风格方面也颇为相似。杰尔查文在《纪念碑》中沉思了自己所度过的创作岁月,认为自己最为不朽的艺术成就是:

我第一个大胆地用俄语诙谐的音节,

赞美费丽察的善行。

带着心灵的朴实我微笑着和皇上,

谈论上帝和真理。^⑪

这里“费丽察”是指叶卡捷林娜女皇^⑫。杰尔查文得意于自己可以与女皇“诙谐”地谈论上帝和真理的勇气,好像将自己分成了两种身份:诗人和大臣。这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与沙皇谈话当然是以臣子的身份。而坚决拒绝出任公职的普希金则将自己完全看作一个独立于所有世俗权力之外的诗人,一个超然的先知和人民永恒道德理想的歌者:

我将永远被人民喜爱,

因为我的诗的竖琴唤起了那善良的感情,

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

并为那些倒下的人召唤宽容……

普希金不光以这首同墓志铭的“纪念碑”诗篇,而且以其终生的优美诗歌创作表达了卓越的诗歌艺术理念:诗人的创作目的是追求理想,而不是道德说教。诗歌不是教诲人,而是激起人们心灵中“善良的感情”。力图给人们精神完美的追求以灵感推动,唤起人们生命中的美好情感,这是任何诗歌艺术所必须诉求的。拿“残酷的时代”与美好的“自由”相对比,呼唤永恒的真、善、美——这正是普希金的缪斯所奏响的最悠扬乐曲。

注释:

①彼得·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曾加入十二月党人组织,著名《哲学书简》的作者,与普希金交往深厚。普希金为此专门写有著名的《致恰达耶夫》一诗。

②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其哀歌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声,因反对雅各宾派被处死。

③以十二月党人领袖雷列耶夫为首的诗歌艺术观强调艺术当下社会功利性,力图使诗歌服务于他们所从事的,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事业。

④普希金这封给诗人茹科夫斯基的书信大约写于1825年4月20~24日之间。详情参见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А. С. Пушкина (вместит омах), том девятый: Письма [С]. №131, Изда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59~1962.

⑤六翼天使(Серафим)出自圣经《新旧约全书》以塞亚书第6章第2节,是所有九级天使中位阶最高的,即赞美上帝的天使,有三对翅膀,称六翼天使,扮演上帝沟通者的角色。

⑥阿波罗在古希腊神话中又被称作太阳神,掌光明,为光明神,但同时又掌文艺之神,普希金此处大概将其看作文艺神。

⑦此处题词为法语,意思是:外行者,请走开!

⑧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斯拉夫派”、“纯艺术派”与革命民主主义派围绕本土文学发展的“普希金方向”和“果·戈里方向”之争旷日持久,延续达半个多世纪。

⑨普希金这首诗的篇首题词“Exegimonumengtum”为拉丁语,是借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句,意思是:我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⑩此处为笔者试译。贺拉斯《纪念碑》一诗的拉丁文、

(下转第56页)

